

群体嵌入与对话资本： 越南“新型台商”非经济活动探析

张晋山 徐子棋 刘澈元*

摘要：“新型台商”是台当局推进对外“实质关系”，拓宽“新南向”政策通道的工具载体。通过归纳台湾跨境资本在越南的演进过程、活动特征及影响范畴，分析此一群体的商业行为异化及“经济人”角色嬗变，可以认为越南“新型台商”在总体上处于“蓝绿”板块偏移、“台独”势力扩张的转向关口。改变这一局面亟待新时期海外统战工作发挥争取人心的作用，以提升中越两国政治互信为基础，依托我在越侨胞及广大华商力量，加快越南台商向“爱国团结对象”的群体转变。

关键词：“新南向”政策；“新型台商”；非经济活动

中图分类号：D82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24）02-0077-12

DOI:10.13818/j.cnki.twj.2024.02.004

近年来，受蔡英文“做台商的后盾”、“让台湾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的怂恿指使，部分越南台商热衷为民进党当局谋取“国际空间”奔走鼓吹，试图在经贸活动之外充当台越“实质关系”的“南向”前驱。那么，能否发现此一现象的内外动因并从中找到海外台商反“独”促统的可行办法，就成为现阶段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加强海外爱国力量建设，涵养壮大知华友华力量”讲话精神，实现“把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全体中华儿女都团结起来”目标的关键。

一、问题缘起：“新南向”与“新台商”的意义互构

2017年7月1日，台当局“外交部次长”吴志中称“政府上台推动新南向，要让实质的关系更具体化，因为我国本身也是东南亚国家”^[1]。台“总统府资政”萧新煌亦认同此一看法，强调“新南向不要矮化为经贸策略”“现在要有一批新台商到南向去”^[2]。此后，承载“不要走老路”期许的“新型台商”说辞屡见报端，并被赋予“民主合作、公民社会跟人民交流^[3]”的整体内涵及群像特征。

实际上，所谓“新型台商”是台当局平衡乃至取代岛内产业界“西进”大陆的政策产物，它脱胎于“戒急用忍”宣传下奔赴“南洋”的本土资本，却在“新南向政策”背书下孕育成形。它既不同于广义层面上“以获利经营为目的而持续旅居国外的台湾人”^[4]，也非两岸语境下“旅居中国大陆的台籍人士”^[5]，

* **作者简介：**张晋山，男，政治学博士，副教授，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徐子棋，女，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21级政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刘澈元，男，经济学博士，教授，广西师范大学桂台合作研究院主任。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2ZDA125）阶段性成果；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马来西亚广西总会反‘独’促统问题研究”（项目编号：YN2022001）阶段性成果；2023年广西区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印太战略视域下美国‘东南亚青年领袖倡议’项目实施研究”（项目编号：XYCSR2023006）阶段性成果。

而是专指“新南向”以来通过投资贸易或慈善捐助来配合民进党当局谋取“国际空间”的部分东南亚台商及现象。就群体而言,其尚未形成身份自觉且开展组织建设,但从现象看,近年来却在我周边地区蔓延扩张。

越南是台当局发展对外“实质”关系,投身区域一体化的战略节点,也是“新南向”背景下岛内产业界拓展海外市场的核心区域,由此衍生出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且组织结构庞杂的台商群体。目前,在越台企无论是经贸额度、社会评价及企业形象都堪称台方倾力打造的样板工程,其管理阶层也被外界视为“新型台商”的代表群体。据“台商与台湾印象”(2019-2021)调查数据显示,越南台商(75%)的新闻报道率远超印尼(27%)、泰国(60%)等地台商^[6],《自由时报》等“深绿”媒体更大肆吹捧越南“新型台商”是“企业公民责任”的实践产物,代表着“台湾在新南向国家中整体形象提升”^[7]。

目前学界对“新南向”背景下越南“新型台商”的群体特征及活动异象尚存争议。台湾学者近年来一改“越南台商势力庞大,但越南外交政策坚守‘一个中国’原则”^[8]的既往看法,认为“越南形成密集的台商聚落,促进了台越政府、业界以及民间社会密切的交流,台湾与越南之间形成密不可分的伙伴关系”,进而产生出“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必会成为东南亚国家想要了解的发展策略”^[9]等乐观判断。大陆方面虽坦承越南台商“会对台湾与东南亚、东南亚与中国以及海峡两岸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10],也提醒这让“民进党当局寻找议题制造我与周边国家矛盾产生可能”^[11]。但在整体上还是认为中越关系平稳发展能够遏制“新南向政策”的政治外溢效应。来自东南亚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尽管越南有意借助台商力量开展经贸往来,但更多是希望“维持这一友好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12]。

但需指出,部分越南台商日益不同于大陆台企精英“拥蓝反绿”及岛内商业人士“蓝绿两边下注”的行事风格,甚至和菲律宾、泰国等地台商“绝口不提政治”大相径庭,而是更多地活跃在民进党选举造势的后援团体之中并渐成“台独”金主,其相关社团在营造“企业公民”设定的同时,也在为建构“自由民主”、“开放”的台湾“国家形象”投放海量资源。那么,这种“以经促政”现象究竟是其投资、贸易行为的商业逻辑使然还是经济考量之外的刻意效应?进而言之,基于经济理性人假设下的越南台商缘何在营收利润持续下滑的情况下大举增资,并呈现由南到北的全覆盖格局;按照经济一体化理论推演的外资额度—外商地位—外事关系的线性理解,越南“陆强台弱”资本格局又怎会让陆企及中国大陆的整体印象双双走低?

当前可供借鉴的思考是,私营企业虽基于纯粹的商业利益进行投资、市场研究和产品开发、开拓市场,但当国家(地区)出面支持或指导这些相同的经济行为时,它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经济行为^[13]。就此而论,目前“新型台商”之所以在越南异常活跃并从“只经不政”转身为“以经促政”,主要还是服从“1997年之后,唯有越南可以和大陆竞争”^[14]的政治考量,进而将自身作为在我周边国家营造“反中”氛围,输出“台独”意识的政治工具。

基于此,本项研究拟从过往台商研究的经济导向及利益分析中跳脱开来,转而探讨该群体在越南所开展的社会公益、文化输出及教育渗透等非经济活动,并在“新型台商”的概念框定下就其所引发的台越关系变化及周边形势异动展开讨论。在此基础上,围绕新时期“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15]这一判断,就争取越南台商立场转变,促成海内外中华儿女反“独”促统局面提出若干主张。

二、如何嵌入？越南“新型台商”非经济活动的动态分析

上世纪后半叶，台湾地区前后出现三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16]。参照“台湾跨国资本援引投资地方与社会资源的逻辑，是镶嵌于其形态特征以及地方社经文化之中^[17]”的既有认知，可以发现大部分越南台商体现出“经济理性人”向“社会理性人”的群体嵌入过程。

（一）越南“新型台商”非经济活动的演进轨迹

1989年越南首家台资企业落地投产。此后较长时间内，越南台商以中小企业主为主，对配合国民党党营部门推进“务实外交”的主观意愿及现实条件均不充分，但其中仍有部分人士借助当地关系为李登辉当局“南向政策”奔走宣传，由此形成“新型台商”雏形及早期行为模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越南台商损失惨重，在地投资跌落谷底^[18]。岛内各界因此强烈呼吁改变其“空有南向之名，却无南向之实”的被动状态。

2000年5月，台湾政党首次轮替、陈水扁对“南向政策”进行调整。2002年4月台当局颁行“南向政策行动纲领草案”，越南首度被纳入政策实施的优先对象。同年9月，升格为“部长级”首长带队的“东南亚投资贸易访问团”赴越参访。此后，越南台商的投资规模扩大，其与所在国的社会网络逐步打通，再次“新型化”的主客观因素渐次完备。但就整体而言，“民间企业会利用当局南向政策的种种便利，却不易为当局用作增加国际组织舞台角色的工具”情况仍未改变，以至被岛内学者批评为“只重经贸而未结合文化、教育、社会和政治等方面，是其效果大打折扣的重要原因”^[19]。

2008年5月，马英九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开始对“南向”与“西进”的政策关系进行回拨调整。受此影响，越南台商在总体上以不破坏两岸“外交休兵”为行为准则。但在随后蔡英文当局的“新南向政策”图景中，越南被拔高至从“台湾与东南亚”向“台湾在东南亚”的中转桥梁，当地台商更成为台湾与东盟国家达成“策略性结盟关系”、“21世纪新伙伴关系”的政策推手。至此，尽管海内外对“新南向”变“新难向”的质疑此起彼伏，但都无碍于以“新技术、新产业、新形象”为标签的越南“新型台商”异军突起，他们不仅“成功使台商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达一定规模，当可作为未来在此南进之基础”，更因其“投资和生产组织的建立是一定程度镶嵌在被投资地点的空间条件与空间所承载的经济社会条件上”^[20]，俨然成为台当局构建所谓“亚洲繁荣共同体”不可或缺的象征物件。

（二）越南“新型台商”非经济活动的发生路径

1、台商企业持续构建“产品—企业—国家”关联印象

本世纪初，“科技发达”、“遵守法制”是越南台商给当地社会留下的初始印象，其增加投资、扩大就业等经济活动也为越南各级政府认可。“台商进来得早，是在越南最困难时候进来，越南政府会在适当时候回报你，而且只要有新投资机会，越南政府都是优先给台商”^[21]。像较早进入越南投资的台湾庆丰集团被特许横跨机车制造、水泥生产及金融保险等领域，其董事长2004年被时任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授予二等劳动勋章。

此后，台塑、鸿海等台资大厂为回应劳资纠纷、环保污染等质疑批评，转而采取了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强化照顾劳工福利，扩大参与社会活动，以及注重企业形象宣传的营销策略，还有部分台资企业参考日韩的文化行销模式，以影像制品、明星人物及网络游戏来植入“台湾印象”宣传。据数据显示，越南民间对台商的整体印象大幅改观，85.9%的越南企业高管表示愿意任职公司与台商深入合作，越南民间的受访者中也有81.7%的受访者给予“良好”评价。就总体而言，台湾企业目前在越南十大投资国（地区）企业中好评度位居第二^[22]。

上述情况为越南“新型台商”将企业自身形象—台商整体形象—台湾“国家形象”三者挂钩提供了可能。2017 年越南精密集团胜邦金属公司组织 600 位越南员工赴台旅游,声称此举为了展现企业的“开放国家”属性,促进台越“两国”之间深度合作。此外还有台商自诩“越南是少数对台湾、中国的关系很懂的国家,对台湾主体性也有高度的认同感,非常难能可贵”^[23],频频以“自由民主”标签来区隔两岸产品及陆台企业,试图达成增加产品附加值,进而提升台湾好感度的企图。

2、台商组织开展台越“实质关系”政策游说

1994 年 6 月,“越南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宣告成立,并在“总会+分会”模式下孵化出若干个分支及“紧急事故应变小组”下级机构。截至目前,越南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及联谊会约有会员 1700 个,下设 14 个地区商会与四个行业联谊会,同时还成立面向台商后代的总会青年团组织。此类组织早期多以交换商业信息、处理成员突发事件为宗旨,但在台当局以人事干预、经费支持来强化其“促进越南与台商间之联系”、“增加台、越两国民间了解”后,它们逐渐成为“在国际重建新秩序的关键时刻,台商应能协助建立台湾的国际地位”^[24]的助力机关。这体现为:

(1) 为台当局官员赴越参访提供便利条件

近年来,越南台商多次为台“部长级”首长赴越活动提供安排,并在台越高层会晤、台侨选举拉票等场合给予实际帮助。前台“驻越代表”胡家麟坦承,“因台越未有正式邦交,台湾地区‘外交官’根本很难见到越南高层官员,都是要配合台商去拜访才见得到”^[25]。

(2) 争取越南支持台湾参与“区域一体化”

目前,越南台商总会不再满足于“作为越南与台湾企业的桥梁”,而是希望在“在台湾企业注资进入越南市场以及有效经营等方面有着很大贡献”^[26]肯定评价基础上,进一步争取越方支持台当局参与亚太经济整合。2021 年 10 月,越总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宣布支持台当局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CPTPP),并以建议书方式来争取越南政府正面表态。

(3) 对中越经贸关系施加政策影响

2017 年 4 月,越南台商商会联合总会与越南商工总会签署合作备忘录(MOU),宣称要推动越方经济改革从“走中国道路”转为“学台湾经验”。越南台商西宁分会、同乃分会与越方海关及税务部门也举行政策座谈会,来为吸引大陆台商持续南迁出谋划策。此外,台资 Formosa 集团还专门提醒越方对中国大陆钢铁产品的倾销问题予以关注,呼吁越方提高 20% 关税、建立进口产品认证制度来实现对本国钢铁产业的市场保护^[27]。

3、台商报刊积极营造“新南向”舆论环境

2008 年 12 月,越南台商在原有《越南台湾商会联合总会会讯》基础上创办《越南台商》杂志,并改变前者侧重行业联谊内容及商业政策信息的内部刊物性质,大量增加越南发展时评、成功台企专题及华文教育报道等栏目且面向越南社会公开发行。此后,《越南台商》开始以胡志明市为基点向中北部拓展,进而成为囊括越南 80% 省份的主流商业杂志。

2016 年蔡英文提出“新南向”政策,《越南台商》对此大幅报道宣传,并在世界台商联合总会的组织下配合撰写“经贸投资—越南篇”白皮书。2017 年 9 月 7 日,该白皮书在世界台商总会、亚洲台商总会、越南台商总会及各分会台商代表列席见证下,由时任越南台商总会会长许玉林正式递交给越方,由此让台湾成为欧盟之后第二个向越南政府提交政策白皮书的外来投资地。在此示范效应下,其他东南亚台商协会也动员内刊杂志征集信息,并于 2018 年 4 月相继完成对“泰国篇”、“菲律宾篇”的统稿编印及正式递交事宜。

4、台商学校开展“以台代华”教育输出

上世纪末，越南台商创办一系列面向台籍员工子女、采取岛内教育制度并经台“教育部”立案许可的办学机构。这其中，1996年成立的越南胡志明台湾学校是办学层次全，招生人数多的“海外五校”之一。此外，平阳台商幼儿园、非凡教育中心越南台商办学场所也承担子女教育衔接乃至推广华文学习的相关功能。

在此过程中，部分越南台商意在当地建立“一个以台湾人为中心的华人族群光谱”，这使得部分台商学校基于“台湾人才是真正的华人，东南亚华人或者中国人都是不是真正的华人”^[28]的荒谬意识，开始将“认识中华民国台湾”、彰显“台湾精神”、“台湾人文”作为课程内容。这一做法随即得到台当局的认可支持，不仅在预算审核、人员派驻及教师选定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还怂恿鼓动台商学校无视越方教学管控。如胡志明学校坚持使用台版“社会”课程教材，拒绝越方对有违“一中”原则章节目录的涂改要求，并利用本校学生的“越南妈妈”吸纳当地民众参加“周六华语文推广班”，进而打破不能招收越南学生的相关规定。

（三）越南“新型台商”非经济活动的个案呈现

2018年7月，越南凯胜公司家具以“防止被误认为中国企业遭到误砸”为由，在厂区大楼悬挂台当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此一明显违背越南相关规定的“玩火”举动引起海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自由时报》认为这是“越南政府允许台湾企业悬挂中华民国国旗”的政策先兆。中国大陆则在批评“（越南）台商是否值得沾沾自喜”同时，明确指出“此举显然不符合越南对中国的承诺”。8月2日，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氏秋姮表示越南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种做法是企业的自发行为。此后在越方勒令下凯胜集团撤下违规旗帜。

作为“换旗风波”的始作俑者，凯胜集团董事长罗子文是越南“新型台商”的代表人物。他于1989年来大陆投资创业，并从百人小厂发展为员工3800名的知名企业，2004年其企业南迁越南，从而成为台当局“新南向政策”颁行后第一批“脱中赴越”台商。2014年5月，越南民众打砸中资企业，凯胜家具工厂亦受冲击。这成为罗子文用“打细姨小孩给大老婆看”来定调越南排华活动，进而“顺理成章把国旗挂起来，作为识别中国与台湾企业”^[29]的动机缘由。此后，罗子文以企业扩建生产、回台上市募资及“打算再开辟一个综合产业园，把广东的供应链企业一并带过来”来增加谈判筹码，并最终在越南台商协会及相关社团的帮助下达成目标。

实际上，在罗子文之前已有若干越南台商对展现所谓“国旗”、“国徽”进行试探。2014年3月，台“立委”访问团赴越参访，时任越南台商总会会长刘美德在接到“台商学校或是驻越南台湾办事处，潜规则就是通通不能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越方通知下，仍指使接待台商违反此一规定。2017年2月柬埔寨政府禁止当地台企悬挂违规旗帜，越南台商某代表人物公然呛声“‘国家’、‘国旗’对他们来说深具意义，台商在海外单打独斗很久，难道连基本的‘国家’都不存在？”^[30]

由此看出，凸显“中华民国”政治符号，形成越南民众“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刻板印象并非罗子文等个别台商的期许愿望，而是长时间以来台商群体与越南政府利益博弈的政策公关行为。之所以选择在2018年公开挑衅并大肆宣传造势，总体意图也不仅是“台商自保”的经济诱因和利益指向，而是对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全面封杀”‘新南向’与台湾国际空间”的恐惧反射，更是对越方“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中国统一大业，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的底线试探。但问题在于，既然“在大陆巨大的政经诱因吸引下，他们（越南）在大陆和台湾之间如何取舍不言而喻”^[31]，那么试图以“台湾主体性”来凸显身份认同及来源属性的越南“新型台商”，为何让“换旗风波”

在越南乃至周边国家一幕幕徒劳上演？

三、跨境资本流动下台越“实质关系”的政治嬗变

目前来看，越南“新型台商”作为台湾地区与越南乃至中南半岛国家互动的代理工具及活动“桩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跨国企业的行为积极或主动影响东道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32]的政治效应。在此过程中，该群体渐次完成了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对话资本”的角色连跳，并在业务范畴及影响领域上跳脱台当局外事机构及侨务部门的辅助角色设定，转而在拓展台越关系的政策方向及实施空间上均取得若干实质进展。

（一）越南“台湾事务委员会”的角色转变及功能扩张

1997 年，越南政府为体现“我们与台湾并无正式邦交，但是我们相当重视台湾”，专门成立了直属越南总理府的“台湾事务委员会”。该机构囊括了外交、财政、贸易、计划投资、关税总局、中央银行、司法、公安等 16 个部委官员，并在“越南政府对台湾事务之专责机构”^[33]定位下，委派委员会主任、秘书长等领导成员及组建若干科室负责日常工作。

“台湾事务委员会”早期以招揽台资为工作重点，同时注意对台越关系非官方属性的严格把握。2000 年岛内首次政党轮替，该机构开始强调“在处理一般台、越业务以外，也肩负有学习台湾经验，发展体制等责任”，并对陈水扁的“南向”政策表示肯定。此后，在岛内“如果没有政治因素，台商早就超越日韩”^[34]的抱怨下，该机构开始强化与“越南台商联合总会”及台驻越代表的工作联系，以至被时任台商越南总会秘书长杨玉凤评价为“台商的活动只要邀请越南出席，（台湾事务委员会）大多会派人员与会”。

2016 年蔡英文上台后，越南“台湾事务委员会”迎合岛内“西进不如南向”造势宣传，且更多地出现在台越官员互动及文教交流场合。这表现在：其一，该机构主任武进禄多次表示“对新南向政策乐见其成”，并提出“不仅在投资方面，在双方贸易、科技及人文交流方面也要进一步加强台越合作关系”^[35]；其二，长期担任“越南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且获台当局“睦谊外交奖章”的陈维海升任“台湾事务委员会”秘书长，后代表越南政府接收当地台商协会递交的投资白皮书，并多次陪同台驻越代表出席“越南台湾形象展”等活动；其三，其关联机构越南商工总会代表 2023 年公开出席台代表机构“双十国庆”活动，期间台越人员更互唱“国歌”以表达“台越两国之间的互敬互重”^[36]。

上述迹象表明，基于对“新南向政策”的机会主义认知，越南涉台政策体系的内外机构及主从关系发生差序调整，“台湾事务委员会”的经济导向及服务属性也悄然变化，其领导成员开始从驻台代表处遴选产生而非之前的越南广州总领事馆，并且在“台商逐渐往北部与中部投资，能够平衡越南的区域发展”的政策考量下，该机构的涉台窗口单位及决策话语权日益彰显提升。

（二）越南民间社会“亲台远陆”的刻板印象及舆论形成

近年来，越南台商的文宣造势活动对蔡英文当局的“柔性外交”起到了助力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建构起当地民众与大陆“近而不亲”却对台湾“美丽想象”的政治光晕现象。目前台湾地区在越南外来投资地的整体评价中排名第二，是仅次于日本的“最受欢迎国家（地区）”。这其中，有 63.3% 的受访者对台越关系做出正面评价，支持双方加强合作的占 85.9%。相较印尼、泰国等地而言，越南中产阶层不仅对台商的“富裕”（4.18）、“慷慨”（3.87）青睐有加，更对岛内“自由民主”（4.29）、“开放”（4.03）等所谓“国家印象”深刻。而陆资企业及中国整体印象在越南却持续走低，近年来分别以 0.63、

0.42 的低分评价位居后列^[37]。

与此同时，越南政府“一个中国”政策在当地台商的“银弹”攻势下也遭遇民间意见反弹。2014年“5.13”事件爆发后，越南知识界就发出所谓“反中不排华”的荒谬主张，认为越南台商受到波及“实属无辜”。另有越南学者撰文称中国大陆的崛起强大及“一中”原则是台越关系发展的影响因素，主张从“我们很不满中国老是想占领越南的土地”的共情意识出发反对中国统一。受此影响，部分越南民众认为“吞并台湾”会让越南在台劳工、配偶及留学生沦入悲惨境地，由此产生出对台湾问题的“中国威胁论”恐慌情绪。

（三）台湾政治生态中的“鲑鱼回流”现象及均势失衡

2015年蔡英文接任民进党主席以来，提出“台湾派”、“中华民国派”及“中华民国台湾派”大团结的选举主张来争取海外台商的支持帮助，此后又选拔前“驻越代表”黄志芳担任“新南向办公室”负责人，进一步打通了民进党与越南台商的联系渠道及沟通节点。这让东南亚台侨中“蓝强绿弱”格局陡然转变，在一、二十万台商中“有高达七成的政治立场比较倾向民进党”^[38]，而实力最强，人数最多的越南台商在响应蔡英文当局返台投资的同时，更开启了政治上“鲑鱼回流”的返乡参政风潮。

2018年4月15日，越南台商王平川成立竞选服务处，积极为获得民进党市台南市议员提名开展筹备活动。此举得到台南市长黄伟哲、市议员郭秀珠、王竣潭、杨中成等“绿营”人物以及越南“青商会”的协力支持。更值得关注的是，时任越南驻台代表陈维海也打破台湾当局“外籍人士不得公开发言及参与政治活动”的相关规定，亲自到场并以微笑表态以示相挺。此后，更多的越南台商出现在岛内政治舞台并向民进党当局依附靠拢。2020年越南同奈台商会长吴明颖、越南北宁台商会名誉会长颜施锦宴等人与蔡英文、赖清德同场参加“勇敢自信，护台同行”大会活动，并为“绿营”中生代刘建国当选“立委”奔走宣传。

此外，部分越南青年台商还倾向于在民进党之外另觅出路，更愿意在标榜“墨绿”、“急独”且年轻化的台湾民众党、台湾基进党及“时代力量”内寻找政治空间。这其中，具有十年越南打拼经验的邱臣远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近年来，这位37岁才投身选举的“政治素人”被提名担任台湾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兼党团总召，期间因表现活跃多次被评为“优秀‘立委’”，2024年任期届满后旋即成为新竹市副市长，俨然成为台湾民众党在柯文哲之后的下一位政治明星及越南青年台商的样板人物。

目前看来，越南台商凭借其经济实力及组织网络日益成为影响岛内政治生态的重要变量。通过林丰喜（民进党籍“立委”）等早期返台参政者的拉抬提携，依靠当地台商系统乃至亚洲台商联合总会的政治动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获得了越南驻台机构及岛内“新住民”群体的支持帮助，越南台商逐渐从一般性的政治募捐、宣传造势乃至集中投票活动中抽身出来，更多地成为民进党及“泛绿”阵营选举征召的对象人选，从而加剧国民党的人才、资金及支持者的流失状况，甚至有可能让“两大一小”的岛内政党格局出现颠覆性的结构转变。

（四）争取周边国家反“独”的“越南模式”受到挑战

近年来，中国政府就遏制“台独”势力海外活动与相关国家达成了若干“惩戒措施”的共识意见。这其中，以两国联合公报的文字形式，明确我建交国家“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中国统一大业，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不同台湾发展任何官方关系”的做法被称为“越南模式”。这一模式在对国际社会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处理涉台问题产生示范作用的同时，也遭遇到台当局的“反中”宣传诋毁及“南向”政策抗衡，进而“对东南亚台商组织的成立和发展提供辅助和经费支持，企图通过台商组织和台商来推动当局的所谓‘活路外交’”^[39]，这就让“越南模式”

在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实施推进遭遇到严峻挑战。

目前,“只同台湾(地区)进行非官方经贸往来,绝不同台湾(地区)发展所谓‘官方关系’”的越方表态不断受到侵蚀。这不仅表现在台越官员互访层级逐渐从原先的“司局级”提升至“部会级”,更反映为双方政策协议开始从渔农业合作等经贸领域延伸至公共卫生及司法管理等社会领域。与此同时,由于对台当局叫嚣与大陆“经济脱钩”并帮助越南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存有幻想,容忍岛内分裂势力向越南台商的渗透活动在当地也有了更多的思想市场。

截至目前,前“总统府秘书长”苏嘉全、“立法院长”游锡堃及“交通部长”林佳龙等民进党人物均先后赴越参访并拜会当地政要,蔡英文在2012年申请越南签证虽经中国政府干预未能成行,但“小英后援会”等助选组织却在越南台商帮助下得以成立运转,并逐渐成为“蔡英文总统海内外台商后援会”的骨干团体。而在“民不举,官不究”默许纵容下,胡志明台湾学校及越南台商协会也得以在所谓“国庆”活动中展示“中华民国”政治符号。

台越关系的微妙变化给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涉台政策处理造成了混乱局面。2018年缅甸局势生变以来,台当局声称“对缅甸政治情势的急剧变化表示关切”,并建议当地台资企业悬挂“中华民国国旗”。而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前发言人敏特(Nyo Ohn Myint)对此持乐观看法,并表示本国“一中政策”应更具弹性来从中获利。柬埔寨政府对“我们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做任何影响中国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的事”的政策表态也遭到当地台商的抵触嘲讽。种种迹象表明,台湾当局刻意用台越关系发展的“先进经验”向东南亚地区推广,试图复制“新南向”开道、“新台商”打底、“新机遇”出现的既成路径,进而给促进中国完全统一的良好外部环境制造现实障碍。

四、新时期越南台商“爱国统一力量”的转化路径讨论

综上所述,当前亟待遏制“新型台商”现象的扩张蔓延态势,立足其所在国的政商关系、组织网络及侨情特征,争取越南台商尽快成为全球华人“反独促统”运动的组成部分,从而为全方位、跨区域的号召海外台商群体,“发展壮大台湾爱国统一力量”积累经验。

(一) 坚定越南及周边国家的两岸立场,钳制越南台商“全面绿化”的政策空间

针对岛内以台商为通道向越南及周边国家鼓吹“去红色产业链”,离间分化中越关系并制造周边不稳定因素的策略企图,党和国家要争取让越南及周边国家深刻体认到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市场在中国,前景在中国”,由此破除部分政经人士对“经济学台湾”的发展迷思,改变对岛内资本争相吸纳的短视行为,力争在当地主流社会的支持下开展“反独”命运共同体的机制构建及工作实施。在此基础上,重点就当前越南台商“亲绿”人士多,动员能力强且组织程度高的严峻情势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遏制策略。

首先,继续保持中越两国在台海问题上的密切沟通及政治互信。依托长期建立的“党对党”联系管道向越南方面说明台当局“反中反共”的一体两面性,提醒越共注意岛内分裂势力借助台商组织输出西方意识形态,勾结当地意见领袖发动“颜色革命”的动态趋势,从而为双方从政策层面联手“制独”,防范“新型台商”创造有利条件。其次,积极开展对越南涉台机构的情况摸排及争取工作。基于越南“台湾事务委员会”在涉台政策上的位阶提升及影响加大,当前需就其机构运转及业务范畴开展情况摸排,防止其从招商引资的服务部门向越南“新型台商”的代理人机构发生转变。最后,密切关注越南台商学校的“民主华语”输出。一方面要从师资、教材到办学场所等方面为吸引越南民众中文学习创造条件,

并通过简繁体、拼音标注使用、流通的排它性策略来降低台湾华文教育的吸引力和通用性；另一方面则建议越方对“胡志明台湾学校”等台校的课程设置加强监管，尤其是加大对其通识课本的两岸关系内容审查，杜绝防止台商子女受“台独”教材影响成为“绿营”支持者。

（二）争取“三陆人员”的支持配合，构建越南台商“反独促统”的社会网络

长期以来，越南台商处于“企业陆干多，业务陆商多及家庭陆配多”的社会网络之中，但囿于管理权限、商业伦理及性别地位的限制，上述人群难以对越南台商统“独”态度上发挥实质影响。但伴随着台海形势发展及越南等新兴经济体的产业布局变化，当前以“三陆人员”引导越南台商的两岸立场，抵制“台独”势力渗透的时机条件已经成熟。

其一是“陆干”经营话语权的大幅攀升。当前大部分在越台企中“陆干”不仅在人数规模完成了对“台干”群体的取代替换，并依靠在生产一线管理及产品质量管控的岗位优势对台企业经营具有了指向作用；其二是“陆商”议价能力的显著提高。无论是早先尾随台商南下的中下游配套厂家，还是近年来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进入越南市场的大陆央企，目前在越南的投资影响及产业链作用都具有明显优势，这让惯于“西瓜偎大边”的越南台商对台海博弈也有了更为清晰的参照体系；其三是“陆配”依附意识已然减弱。近年来，相当多越南台商采取“前店后厂”模式来兼顾中国大陆及海外市场，主要由定居内地的“陆配”家属负责经销事宜，这也相应提高了她们对越南台商的影响程度及引导作用。

而从“三陆人员”的出身环境及教育背景来看，他们都具有对越南台商施加正面影响的思想觉悟及行为意愿，但这也需要对其给予必要的支持帮助。当前可酌情将长居越南且与越南台商业务紧密的“陆商”代表列为对台工作对象予以帮扶，并视在越台商的“陆配”具体情况进行甄别选拔，鼓励其通过家庭关系开展说服工作。此外，还可以将越南台塑集团党支部作为样板范例，争取在更多的越南台企中成立“陆干”基层党组织，以此推动越南台商在两岸统一问题上做出“听谁话”“跟谁走”的正确选择。

（三）做好“经济统战”内外对象衔接，促进越南台商“以新带老”的观念传承

大陆台商长期被外界视为“以商逼政”对台“经济统战”的有效策略^[40]。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投资经营环境转变，台商转型的策略可归纳为‘区域发展’、‘转进其他产业’以及‘开发内需’”^[41]。这其中，一部分大陆台企相继将工厂移至越南，进而对闽南族群多、中南部地区多且中小企业多的越南台商产生了稀释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新老掺半、“蓝绿”各异的主体构成及组织形态。但问题在于，部分具有大陆创业背景的越南台商却反而在台驻越机构及外围组织的蛊惑下逐渐淡化“统独”立场，进而成为“新型台商”的活跃分子及骨干成员。

当前需在“大统战”格局下理顺对台统战与海外统战的工作关系，保证大陆台商在事业重心外移的同时坚守“反独促统”初心，从而带动更多的海外台湾民众服务于祖国统一大业。首先，亟待正确看待台商资本流动及国家认同的辩证关系。纠正对大陆台商迁移海外的“泛政治化”看法，区别越南台商、越南“新型台商”及越南“绿化台商”三者间的本质不同。在此基础上，保持与具有大陆创业背景的越南台商的思想联系及政策沟通，通过“内外”统战工作的有机衔接，争取在陆台资跨境流动中“人不丢，点还在”从而为其最大程度地“为统所用”创造条件；其次，打破当前越南台商总会为台当局控制且在当地“一家独大”的组织垄断现状，鼓励部分越南台商参照大陆台企联模式另起炉灶，建立起对我友好，服务两岸且对成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台商组织；最后，推动越南陆商及当地华人商参与越南台商的四大行业协会，淡化其原先的台湾本土性特征及自我封闭性质，推动中华民族经济共同繁荣为指向的海外“朋友圈”尽快形成。

（四）利用“蓝绿”阵营“侨务”矛盾，加快越南台商“统派”领袖的政治培养

当前台湾政党政治的选举生态日趋激烈，岛内民众也在族群意识、“统独”意识的观念割裂走向“极化”，这迫使“蓝绿”阵营更多地把目光投向数百万台商的选票资源及动员体系，并争相将越缅甸柬埔寨及老挝等新兴国家的台商群体视为“侨务”重点。目前国民党已改变对东南亚台商的轻视态度，力图唤起该群体的“中华民国”认同并扩大“泛蓝”基本盘，而这不可避免地会与民进党当局的“侨务台独”政策发生激烈冲突，进而让越南台商从龙头企业、社团领袖到关联群体都处于多元分裂状态。

在此情况下，对台工作一方面可以适当加强同“泛蓝”阵营的海外合作，借助越南台商中“亲蓝”人士对“台独”势力的渗透扩张予以遏制；另一方面则需鼓励岛内“统派”政党扩大海外分支机构，从而为不愿在“蓝绿”之间选边站队的越南台商提供诉求表达、政治参与的组织渠道，并从中甄别选拔若干积极分子成为越南台商的“统派”代表人物。

结语

越南台商是数十万在外打拼，以开拓新兴市场，完成跨境资本增值的“经济候鸟”群体，更是广大海外台湾同胞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新型台商”现象在他们中间的出现蔓延固然是台当局借助“新南向政策”威逼利诱的结果，但也和该群体在台海形势错综复杂情况下急于“找出路”、“求照顾”息息相关。新时期海外统战工作要面向他们“广交朋友”，在为其异国他乡创业提供声援支持的同时也不放松两岸“心灵契合”上的传道解惑，从而帮助越南台商尽快摆脱“台独”同路人的身份标签，最终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海外“反独促统”的先进榜样。

注释：

[1] 王孟伦：《新南向论坛吴志中：台湾也是东南亚国家》，自由时报，<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115371>，2017年6月29日。

[2] 曾慧萍：《玉山论坛遇中国问题萧新煌：不刺激不主动》，中时电子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1004003412-263101?chdtv>，2017年10月4日。

[3] 苗秋菊：《“中研院”社会所特聘研究员萧新煌主讲“新南向的发展”》，自由亚洲电台，<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angtai/km-06132017114646.html>，2017年6月13日。

[4] 萧新煌、王宏仁、龚宜君主编：《台商在东南亚：网络、认同与全球化》，台湾：“中央研究院”亚太研究计划，2002年12月。

[5] 耿曙：《中国大陆台商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站在新移民研究的起点？》，“台商研究工作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兴大学，2008年11月，第22-23页。

[6] 徐遵慈：《台湾与台商形象越南调查计划》，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file:///C:/Users/LENOVO/Downloads/ce51fea5-af18-481c-ba65-f5798a615043%20\(1\).pdf](file:///C:/Users/LENOVO/Downloads/ce51fea5-af18-481c-ba65-f5798a615043%20(1).pdf)，2019年12月。

[7] 萧新煌、徐遵慈、杨昊、童成家：《在东南亚的台湾与台商形象》，自由时报，<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480435>，2021年10月24日。

[8] 林若雯：《新世纪台湾对东南亚的外交战略》，新世纪智库论坛，2000年6月30日第10期，第31页。

[9] 陈建甫主编：《台湾与东南亚国家的中国研究视角》，台北：翰芦图书除恶版有限公司，2021年3月版，序言部分。

[10] 王勤：《台湾对东南亚直接投资与“南向政策”》，《台湾研究集刊》，2003年第2期，第96页。

[11] 陈丽丽、王建民：《“洪素珠现象”与“台湾民政府”》，《统一论坛》，2016年第5期，第39-40页。

[12] 吴明清：Quan hệ kinh tế Việt Nam - Đ à i Loan hiện trạng v à triển vọng。

[13]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第401页。

[14] 王立礼：《台湾省南向政策与台商大陆投资策略》，收录于魏维贤、张玉安主编：《“面向21世纪的东南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第140页。

- [15] 习近平：《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求是网，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2-07/30/c_1128877727.htm，2022年7月30日。
- [16] 顾长永著：《台商在东南亚——台湾移民海外的第三波》，高雄：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6页。
- [17] 龚宜君：《出路：台湾在东南亚的社会形构》，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2005年12月，第3页。
- [18] 丁万鸣：《南向铩羽而归，台商不堪回首》，台湾《联合报》2002年7月30日，第2版。
- [19] 宋镇照：《建构台湾与东南亚新世纪关系：南向发展之政经社场域策略分析》，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6年3月，第117页。
- [20] 陈东升：《地域网络与族群关系：东南亚台商的研究》，“‘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研究计划报告”，2002年10月15日，第36-37页。
- [21] 江睿智：《孤军打越战，台商节节败退》，中时电子报，https://city.udn.com/227/1989281?tpno=40&cate_no=227，2006年12月13日。
- [22] 徐遵慈：《台湾与台商形象越南调查计划》，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2019年12月，第24页。
- [23] 施凯文：《台商形象大跃进，在越南赢过美中》，《台湾醒报》，<https://anntw.com/articles/20191009-iIXh>，2019年10月9日。
- [24] 萧新煌、龚宜君：《台湾在东南亚：台商的历史、性格与未来发展》，收录于萧新煌、王宏仁、龚宜君主编：《台商在东南亚：网络、认同与全球化》，台北市：“中央研究院”，2002年10月，第12页。
- [25] 中评社：《孤军打“越战”台商：台湾还在争吵意识形态》，中评新闻网，<http://hk.cntt.com/doc/1002/6/8/3/100268374.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268374>，2019年11月30日。
- [26] 越南总理府台湾事务委员会至越南台商总会成立“越南投资咨询服务中心”函，文号：0646/PTM-UBDL，https://www.careernet.org.tw/upload/202206/News_9506_cycda339.pdf，2022年5月20日。
- [27] 阮德：Nguy ê n Đức, “Formosa đẩy nhanh tiến độ v ì lo... mất tiền”, B á o Đầu tư,ng ù y. <http://baodautu.vn/formosa-day-nhanh-tien-do-vi-lo-mat-tien.html>，2014年3月8日。
- [28] 龚宜君：《出路：台商在东南亚的社会形构》，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2005年12月，第201-202页。
- [29] 纪佳妘：《台商用完美稳坐越南家具龙头》，Ettoday 新闻云网站，<https://finance.ettoday.net/news/1244618>，2018年8月27日。
- [30] 宝智华：《越南泛蓝台商首度公开挺韩国瑜，李佳芬哽咽泛泪》，苹果新闻网，<https://www.appledaily.com.tw/politics/20191026/BEBSRGZZVC7037TSHBMH07NYIQ>，2019年10月26日。
- [31] 叶宣：《抗议殃及台商，台“外交部”建议在缅挂“国旗”》，德国之声，<https://p.dw.com/p/3qeAp>，2021年3月15日。
- [32] 吴介民：《以商业模式做统战，跨海峡政商关系中的在地协力者机制》，收录于李宗荣、林宗弘编：《未竟的奇迹：转型中的台湾经济与社会》，南港：“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2017年出版，第679页。
- [33] “司法周刊”讯：《越南“台湾委员会”秘书长拜会》，台“司法周刊”，<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429-74246-1ec74-1.html>，2006年3月30日。
- [34] 林孟汝：《蜕变的越南，向前行的台商》，“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08125002.aspx>，2018年8月12日。
- [35] 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促进台越交流 林市长力邀亚台商会再访台中》，台中市政府网站，<https://www.taichung.gov.tw/988358/post>，2016年12月3日。
- [36] “中央社”：越南驻处庆“双十”盼台越建立具韧性半导体供应链，‘侨务’电子报，<https://ocacnews.net/article/352351>，2023年10月12日。
- [37] 徐遵慈：《台湾与台商形象越南调查计划》，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file:///C:/Users/LENOVO/Downloads/ce51fea5-af18-481c-ba65-f5798a615043%20\(1\).pdf](file:///C:/Users/LENOVO/Downloads/ce51fea5-af18-481c-ba65-f5798a615043%20(1).pdf)，2019年12月。
- [38] 蔡慧贞：《海外后援会现场“国旗”飘扬，东南亚台商成蔡阵营重点争取对象》，上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1&SerialNo=72200，2019年9月27日。
- [39] 刘文正：《东南亚台商协会的建立及其功能分析》，《东南亚纵横》，2011年第4期，第78页。
- [40] 吴介民：《以商业模式做统战，跨海峡政商关系中的在地协力者机制》，收录于李宗荣、林宗弘编：《未竟的奇迹：转型中的台湾经济与社会》，南港：“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2017年出版，第682页。

[41] 刘柏定、刘孟俊，张荣丰：《中国大陆台商升级转型及其在台湾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探讨》，财团法人中华经济研究院“国内外及中国大陆经济研究及策略规划”研究报告，2012 年 12 月。

（责任编辑 胡石青）

Group Embeddedness and Dialogue Capital: An Analysis of The Non-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New Taiwanese Businessmen” in Vietnam

Zhang Jinshan, Xu Ziqi & Liu Cheyuan

Abstract: “New-type Taiwanese businessmen” is a tool carrier for Taiwan authorities to promote “Substantial relation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and broaden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channel. By summing up the evolution process, activity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scope of Taiwan’s cross-border capital in Vietnam, analyzing the dissimilation of this group’s business behavior and the change of the role of “economic man”, it can be considered that the “New-type Taiwanese businessmen” in Vietnam as a whole are at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blue-green” plate deviation and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force expansion.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it is urgent for the overseas united front work in the new era to play the role of “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people”. On the basis of enhancing the political mutual trust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and relying on the strength of our overseas Chinese and Chinese businessmen in Vietnam, we should speed up the transformation of Vietnamese Taiwanese businessmen into groups that are “patriotic and united objects”.

Key Words: “New Southbound” Policy; “New-type Taiwanese Businessmen”; Non-economic Activities